

职业本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

程伟超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指出，要建设一批办学特色鲜明的高水平职业本科学校。作为融合本科教育层次属性与职业教育类型特征的新型教育形态，职业本科教育在我国正处于起步探索阶段，在实际办学过程中存在着发展定位不清、内涵建设不足、品牌认可不强等问题。为此，迫切需要从办学定位、办学实践和办学特色等方面着手，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本科高质量发展之路。

正本清源：明确发展任务与类型定位

厘清自身发展任务和类型定位是职业本科高质量发展的前提。目前我国正处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生产运营与管理流程愈发复杂，生产关系也发生了根本性变革。职业本科院校应立足新的发展形势，进一步做强产业发展适应性，强化职业类型特色，为高质量发展扎稳根基。

一是对接产业需求，明确动态适配的人才培养目标。在新一轮科技革命重塑产业结构的背景下，职业本科院校要顺应产业升级的需要，满足技术革新、产业结构调整对高端技能人才的需求，明确动态适配的人才培养目标，主动填补高端制造业和前沿技术领域人才缺口，构建“需求感知—培养调适—供给升级”的人才培养方略，确保人才供给与产业需求的精准匹配，为产业发展提供靶向技术人才。

二是坚守类型特色，培养高端技能人才。作为职业教育体系的高阶形态，职业性始终是职业本科教育的核心价值所在。因此，职业本科院校应锚定职业教育“高端化”发展轨道，使其培养出来的技术技能人才具备本科层次的职业学历，能够承担起科技研发、产品开发、服务设计等创造性工作，以确保与现代产业体系的建设需求同向同行，进而彰显出“职业教育精英化”特征，并体现出“一专多能”的培养趋势，避免陷入“学术漂移”与普通本科发展趋同的窠臼。

守正创新：提升内涵建设与人才培养质量

强化办学内涵和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是职业本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高职专科升格职业本科后，首先面临的就是一些新挑战的挑战，因此亟须推动职业本科提升内涵，紧扣“职业性”与“高等性”的办学定位，构建育人范式，完善育人评价体系，为其高质量发展提质增效。

一是深化内涵建设，构建职业本科育人范式。职业本科院校要紧紧围绕高端技能人才培养，以专业建设、课程建设、教学改革为着力点，形成“制度—手段—内容”三维一体的联动办学制度，助力职业本科办出水平、办出特色、办出成效。在专业建设上，要坚持职教发展逻辑与行业发展逻辑的双向耦合，密切关注行业趋势与市场需求，动态调整专业布局，形成与产业链、创新链相适配的专业设置体系。在课程架构上，聚焦专业型技术人才的深层职业属性，在坚持实践导向的基础上，适度提升理论课程比重，以实现技能训练与专业深化的有机统一。在教学改革上，基于实践教学与涉身性知识的传承，进一步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依托新型信息技术开展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一体化教学，创设更具实践特色的教学体系。

二是完善评估体系，提升职业本科培养质量。在内部评价上，职业本科院校应以院校建设和人才培养为核心，搭建数字化监测平台，健全产教融合、教学设施、教学资源、师资队伍等多维评价指标，促进教学质量全方位改进。在外部评价上，应借鉴接触式评价机制，重点聚焦教学质量、科研质量与服务质量，积极引入政府、企业、第三方机构等利益主体广泛参与，推进专业建设优化、课程体系更迭以及教学模式创新，最终构筑起高端技能人才培养的质量闭环。

特色彰显：强化办学品牌与市场认可

品牌特色和市场认可可是职业本科高质量发展的保障。当下，尽管职业本科院校在教育层次上实现了提升，但不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社会对职业院校刻板印象的影响，导致认可度低等问题。因此，亟须打造职业本科教育的品牌特色，持续提升社会认可度。

一是整合校地资源，打造职业本科教育品牌特色。培育品牌特色不仅是抢占发展制高点的关键任务，更是在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的重要利器。作为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力量，职业本科院校应依托地方产业特色与经济社会发展优势，寻找创新发展的突破点和产业服务的契合点，设置具有区域性且符合区域需求的专业，在与区域产业发展的良性互动中提供更为优质的人才、技术与创新支持，打破低层次教育的固有标签，将地方特色的差异化发展优势，转化为具有职业本科教育特色的品牌标杆，提升区域服务能力。

二是提升社会认可度，重塑职业教育市场形象。社会认可度是职业本科院校在就业市场稳固立足的重要支撑，也是衡量其人才培养成效的核心指标。一方面，职业本科院校的办学实践应紧贴社会需求，与企业积极共建职业院校、市域产教联合体、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以“招生—培养—就业”一体化模式，定向培养技术研发和生产管理人才，提升职业本科教育声誉；另一方面，职业本科院校应以积极的形象构建和宣传策略，纠正市场既有认知的偏差，联合官方媒体、行业平台挖掘并宣传优秀学子在一线岗位的典型事迹，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和工匠精神，重塑职业教育的市场形象，努力增强职业本科在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增进人民幸福感等方面的价值贡献。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高职到县：下沉不是终点 提质才是核心

Q 职教前沿

柏大鹏 任胜洪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提出，“推动有条件地区将高等职业教育资源下沉到市县”。高等职业教育向县域延伸，既是国家职业教育改革的战略部署，也是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关键一环。我国县域职业教育面临供需结构性矛盾，其症结在于教育资源配置效率与产业发展动能失衡。高职下沉到县若仅停留在地理层面的资源转移，而忽视教育质量与在地服务能力的同步提升，恐难缓解“学校热、企业冷、学生茫”的现实困境，还有可能加剧教育资源“悬浮式下沉”的风险。

扎根县域：推动县域职业教育特色化发展

高职下沉到县，不是城市高等职业教育的“简单复制”。县域职业教育的核心特征在于其鲜明的地方性，需立足县域产业特质构建差异化发展路径。县域职业教育需要坚持质量为本与特色发展双轮驱动，形成既符合现代职教规律，又适配县域需求的新办学样态。

首先，锚定区别于城市职业教育的服务面向。城市职业教育侧重于对接城市产业升级与高阶技能需求，服务层级较高且人才流动辐射面广。县域职业教育则是聚焦本土产业特色与基层技能缺口，以培养扎根县域、适配本土经济发展的实用型人才为要。当前，城市职业教育的服务层级与人才培养定位面临系统性调整，而县域经济转型升级进程中对技术技能人才结构性缺口不断扩大。高等职业教育资源下沉需坚持以服务地方社会为主，培养留得住、用得上的本土化技术技能人才，让县域职业教育成为推动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人才引擎。

其次，探索不同县域职业教育内生发展道路。高等职业教育下沉要立足县域实际，因地制宜地探索差异化发展路径。一方面，职业教育下沉需充分考虑县域承接能力，对于产业基础薄弱、人口外流严重、教育资源配置不足的县域，高职下沉可能导致资源浪费与办学效益低下。另一方面，不同县域所需的下沉资源应有所侧重。例如，工业基础较好的县域，可重点引入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等相关专业资源，助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以特色农业为主

导的县域，应强化现代农业技术、农产品加工等专业建设，推动农业产业链延伸。只有精准对接县域发展需求，差异化配置教育资源，才能激发县域职业教育的内生动力，真正实现职业教育与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同频共振。

立足产业：构建精准化产教供需对接机制

高职下沉到县，其核心目的在于为县域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队伍。要以县域产业需求为轴心，打通教育链与产业链的梗阻，让县域职业教育真正成为地方产业发展的“助推器”与“动力源”。首先，建立产业人才需求监测平台。要构建与地方产业紧密契合的专业体系，绘制周期性产业人才需求图谱，定期编制聚焦岗位缺口、技能要求及培养路径的县域产业人才发展白皮书。此外，建立校企常态化对话机制与动态反馈渠道，推动教育供给与产业需求实现从宏观规划到微观培养的全流程精准匹配，切实解决人才供给滞后与结构性失衡问题。

其次，实施专业动态化调整策略。要依托产业链和岗位群进行专业布局，不断调整优化群内专业结构，形成紧密对接产业链的专业群体系。推行专业与产业适配度评价制度，实施分类动态管理策略，引导教育资源向重点领域倾斜，实现教育资源与生产资源的深度渗透，使教育资源投放与产业空间分布形成地理耦合。

再次，共建县域生产性实训基地。职业院校需以产教融合型实训基地为抓手，构建县域龙头企业需求牵引和院校教育资源精准供给的双向赋能协同体。职业院校根据企业的生产周期，灵活且动态地调整实训节奏，使教学进程与生产线运行深度匹配。

整合资源：打造高职资源下沉共享新平台

高职下沉到县是立足县域资源禀赋与发展诉求的战略创新，以跨层级资源整合与在地化服务升级为双轮驱动，推动中高等职业教育与县域经济社会深度融合。推动县域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需把握政策机遇窗口，优

化县域职教教育资源配置，激活县域职业教育创新发展的内生动力。

首先，搭建高职资源统筹平台。在平台搭建过程中需重点审视两个问题。一是促公平，破解资源错配的结构矛盾。当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缩小城乡职教质量鸿沟已超越单纯的教育议题，成为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促进社会流动的关键枢纽。二是提内涵，跨越同质化发展的质量鸿沟。通过构建差异化、特色化、精品化的教育供给体系，形成与县域经济独特要素禀赋相匹配的人才培养范式。

其次，畅通高职资源下沉通道。要畅通高职资源下沉通道，需打破行政、技术、机制三重壁垒。政府应发挥统筹协调功能，建立县域职业教育资源统筹中心，通过系统性资源整合破解城乡教育资源的空间割裂与配置失衡。技术层面同步构建资源效能监测机制，实时追踪教学反馈与企业评价数据，依托数字化平台高效整合课程、师资等资源，达成远程共享与精准匹配，提升资源利用效率。机制协同层面推动高职、中职、企业组建紧密利益共同体，通过联合教研、人才互通、基地共建形成资源流动闭环，同时建立动态评价机制，确保资源下沉与县域产业需求深度契合。

多元协同：稳步构建县域职教发展共同体

县域对高职院校下沉模式的认同是多元主体协同的前提。只有多元主体从“被动接受”转向“主动参与”，从“利益相关者”升级为“责任共同体”，县域职业教育才能真正形成“政府统筹协调、院校主动服务、企业深度参与、社会广泛支持”的协同发展格局。

首先，凝聚价值共识以形成县域职教发展共同体。推动高等职业教育资源向县域延伸，既是国家战略层面的顶层设计指向，也是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实践

(作者单位：贵州师范大学)

蜡烛村是万州库区最大的贵妃枇杷生产基地，贵妃枇杷年产值超千万元。重庆三峡职业学院智慧农业科团队为贵妃枇杷生产基地量身打造了一种枇杷实时生长需求探测方法，指导果农实现增产增收。

上图为团队在枇杷果园安装智能追日光伏农业气象站。

下图为团队为智能追日光伏农业气象站硬件选型。

图片选自《光影中的中国职教》

从一本“小教材”看职教数字化“大转型”

Q 研者视界

陆宇正

近日，教育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推进教育数字化的意见》，系统部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终身教育等领域的数字化转型路径。作为职业院校关键办学要素之一，教材凭借知识传播、学习支持、教学指导等功能，在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中所取得的成果，蕴藏在每一本教材的开发与建设之中。

教材形态更新 从“纸质载体”转向“纸数融合”

与普通教育领域的教材不同，职业教育教材具有鲜明的职业性与实践性特征，其内容对接产业技术迭代需求，强调“做中学”的教学逻辑。传统教材主要以纸质为载体，内容以线性结构呈现为主。步入数字时代，纸质教材的缺陷愈发凸显。一是教材内容迭代周期长，二是配套素材有限，三是教材容量受限。

新技术的出现推动职业教育教材进入“纸数融合”的新阶段。这种融合形态并非内容层面的简单叠加，而是借助二维码、增强现实、虚拟现实、云端资源库等技术实现纸质教材与数字资源的深度耦合。教材形态的变化折射出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范式转变。一方面，数字技术不再仅仅是职业院校技能训练的辅助手段，而是演变为驱动职业教育教学升级的核心，渗透教学实施的

全过程，并拓展了师生在教学中的感官体验。另一方面，数字技术打破了纸质教材“知识容器”的传统属性，形成囊括纸质框架、数字资源、智能平台的职业教育立体化教材体系。

教材形态之变，本质上是职业教育知识与技能传递逻辑的重构。当纸质书页与数字代码深度融合，职业教育正以“小教材”为教学支点，撬动人才培养模式的系统性“大变革”。这种变革不仅关乎教学体系的升级，更是职业教育适应数字文明时代的关键一跃。

教材内容焕新 从静态知识转向图谱化、动态化呈现

职业教育的教学目标在于培养能动手、会操作的技能型人才，因此职业教育教材更加注重将知识、技能与真实职场场景深度融合。以机械设计制造类专业为例，教师在使用《数控机床编程与加工》教材时，需要嵌入真实的数控加工企业案例，仅靠教材中的文本内容难以直接对其进行诠释。

传统职业教育教材多承载的是静态的概念、技术原理与程序性知识，并按照学科逻辑进行知识的编排和组织，由其指导的教学活动很难提升学生的职业综合素质和行动能力。而数字技术为职业教育教材内容的革新提供了破局之道。通过生成知识图谱，职业教育教材将离散的知识节点转化为可视化、关联化的技术技能网络。例如，江苏省通州中等专业学校开发出《生活物联：典型产品的制作》活页教材，融合“电子技术基础”“传感器应用技术”等多门课程，把企业岗位任务和教材中的知识技能相融合，确保教材内容与产业技术生

成同频共振的网络拓扑。知识图谱的介入，使师生在通过计算机、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获取相关的海量网络资源时，能迅速回溯或动态索引职业教育知识与技能。

职业教育以数字技术手段重构了知识的组织逻辑与呈现方式，实现了教材内容从静态知识积累的“量变”到图谱化、动态化呈现的“质变”。通过生成由岗位能力、技术技能、职业素养等要素组成的知识图谱，职业教育教材将离散的知识节点转化为多维网络的升级趋势。面向未来，职业教育需要加快建立国家层面的教材动态更新标准，开发基于大数据技术的教材内容智能诊断系统，推动教材内容从“标准化产品”向“个性化服务”的转变，构建起“随产而变、因人而异”的职业教育知识体系。

教材管理革新 从经验驱动转向人工智能支撑

职业教育教材管理具备鲜明的特征。一是国家统筹与分级负责。教材是“国家事权”，经过多年的努力探索，我国逐步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两级规划、两级审定、三级建设”职业教育教材管理体制。其中，“两级规划、两级审定”保证了党的教育方针落地，“三级建设”保证了职业教育教材体系的多元化、灵活化建设。二是突出产业适配性。职业教育教材需紧跟产业技术迭代，如活页式、工作手册式教材等新形态教材形式要实时更新就业岗位新标准与新要求，确保教学内容与产业需求同步。三是管理复杂度高。职业教育教材类型多样，在数量方面，“十四五”首批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就有7251种，包括职业本科教材、高职专科教材

和中职教材，较难协同管理；在形式方面，教材涵盖纸质教材、新形态教材、操作手册等，难以统筹管理。

尽管职业教育教材管理的顶层设计逐步完善，但在现实层面，其管理实践仍面临多重挑战。例如，职业教育教材开发与企业需求存在“时间差”，教材质量评估多依赖人工抽检，难以实时、快速地追踪教材使用效果与适配性。

随着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人工智能技术成为职业教育教材管理的“智慧大脑”。一方面，在人工智能技术的支撑下，教材内容识别与使用审核效率得以提升，可以更快地识别教材中的政治性、规范性风险。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的介入破解了经验主导的路径依赖。通过构建职业教育教材使用监测平台，实时采集职业院校教学行为、学习效果等数据，借助人工智能快速准确地分析教材使用情况。在实践中，已有职业院校借助人工智能技术探索出了教材管理新范式，如衢州职业技术学院构建的跨越多场景的“一云纳管”管理模式。

职业教育教材管理的智能化建设，折射出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新方向。首先，在管理层面，实现了从“经验管控”转向“精准治理”，实现教材质量可追溯、问题可预警、决策可量化。其次，在服务模式层面，实现了从“被动响应”转向“主动供给”，分析研判产业趋势与教学需求，提前规划相应教材的开发方向。再次，在生态构建方面，实现了从“封闭管理”转向“开放协同”，打通“政校企研”多方主体之间的数据壁垒，形成标准共研、资源共建、风险共治的教材治理新生态。

(作者单位：教育部课程教材研究所)